

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阐释及其意义

——对新康德主义者关于伦理与唯物史观之关系的反拨

陈爱萍^{*}

【摘要】伦理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第二国际时期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难题。当时的新康德主义者以对社会主义的伦理解释为前提,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伦理因素,因此需要由康德的伦理学来补充或替代它的道德“空场”。考茨基则主张唯物史观并没有回避伦理问题,正是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才成功破解了观念论伦理观的理论困境。考茨基在反拨新康德主义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逻辑起点、现实基础等重要问题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考茨基;新康德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伦理观

作为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具有明显的折中主义和进化论缺陷,他也因此受到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是,在他纷繁复杂思想和丰富的著作中也能发现一些值得当今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他在特定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初次阐释。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如何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难题。当时的新康德主义中的伦理社会主义者认为,唯物史观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伦理因素,因此需要由康德的伦理学来补充或替代它的道德“空场”。这一观点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伯恩施坦等人所接受,他们不仅试图在理论上用新康德主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伦理因素是社会进程中基础力量的观点,而且还在实践上主张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和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正是在此背景下,考茨基对伦理社会主义者和伯恩施坦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反拨,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对于伦理的基础地位,并进一步指认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逻辑起点、现实基础以及价值取向。

^{*}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14122。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16ZD09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及当代价值”(15BKS066)阶段性成果。

一、对立与调和:新康德主义者对伦理与唯物史观之关系的理解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康德主义的兴起,一些人在“回到康德去”口号的影响下开始借用康德的伦理学论证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新康德主义中的伦理社会主义学派。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社会好与不好的标准是看自由、平等、公正等伦理原则是否得到普遍适用,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恰恰违背了这一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仅仅是作为劳动价值而出现的,纯粹属于社会经济的机器,“在这个机器中,每一个人都只是作为一个机械部件、一种手段在起作用并且被当作手段用坏和吞噬。”因此,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于“突破和扬弃”把人当作“手段”的社会关系,确立一个以实现每一个个人的自由等伦理原则为终极目标的社会。^①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它不是以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不是通过目的论而是通过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这一因果论来论证的。这一论证方式使科学社会主义陷入了自身无法逾越的困境:第一,它不能作为一种善的东西被接受。伦理社会主义者指出,即使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且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能证明自己一定就是一件有益的东西,“一种事物或一个过程并不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它。”第二,科学社会主义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道德假设具有普遍有效性,它适用于一切个人而无关乎其阶级地位。“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应该满足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而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利益。”^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出发并且仅是围绕着其利益的实现来论证社会主义的,这样,它虽然能动员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但不能获得其他阶级的普遍支持。伦理社会主义者因而提出,要克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真正扬弃和突破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当作“手段”的社会关系,唯有借助于康德的伦理学来解决它的道德“空场”问题。

用伦理学论证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面临着如何处理伦理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问题。由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当新康德主义者提出与之不同的伦理社会主义观点时,必然无法回避对伦理与唯物史观之间关系的探讨,这也是他们与科学社会主义者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大致说来,新康德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倾向:其一是以柯亨为代表。柯亨等人认为,伦理与唯物史观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义“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以伦理唯心主义为根源的”^③,只有以伦理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康德早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就已经阐明:“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④因此,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与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相矛盾的,它若不想被彻底摒弃,只能进行自我救赎,即通过“自我纠正”以解决自己在逻辑上的矛盾,并把社会的纯粹经济概念上升为道德概念,使人本身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不仅是其“产品和结果”。^⑤其二,与柯亨不同,以福尔伦德尔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唯物史观与伦理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埃斯纳认为,“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党来说,经济和伦理在实践中不是互相斗争的……每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家,反之亦然。这是同一种世界观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⑥因此,他们没有像柯亨那样完全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试图寻求二者之间的调和。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与康德、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伦理学可以结合,主要有两个原因:从内容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

①③⑤⑥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78、77、78、83页。

②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47.

④[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义观点是在伦理的理想主义推动下产生的,他们著作中不乏涉及伦理问题,沃尔特曼甚至将之概括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伦理潜流”^①;康德伦理思想中反对国家压迫和世袭特权等观点在社会主义思想中也有体现。从思想方法上看,二者可以互补。福尔伦德尔等人认为,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必然”与“应然”之间的统一。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分析虽然论证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告诉了人们“是什么”,但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是什么”以及提供一个判定现状和制定目标的标准,而康德批判的和伦理的方法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康德伦理学与唯物史观的结合将会避免科学社会主义缺乏伦理基础的缺陷。

上述两种倾向虽然存在差异,但在把伦理排除于唯物史观之外、主张唯物史观无关乎伦理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处于基础地位的始终是伦理而不是唯物史观,即使在主张二者可以调和的福尔伦德尔等人那里,唯物史观也只处于次要地位,对社会经济事实的分析只是伦理价值实现的条件之一。与理论上的主张一致,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上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依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主张和平渐进的方式,走一条社会化和民主化的改良道路,并强调“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伟大的道德变革才能完成”。

二、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伦理突破: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阐释

新康德主义者对唯物史观与伦理之间关系的阐释,对社会主义及其实现道路的理解,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伯恩施坦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人试图用新康德主义阐释马克思主义,并进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和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实现方式。正是在此情境下,考茨基认为“迫切需要……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伦理之间的关系了”^②。他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困境的超越,从而间接地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对于伦理的基础地位。以此为前提,他进一步从正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逻辑起点、现实基础和价值取向。

考茨基认为,从古代至启蒙时代,伦理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把道德抽象为普遍适用的伦理原则。他们或从人的自然倾向出发,将道德解释为利己主义,或从人的精神出发,认为道德是存在于自然以外的某种超时空的神秘力量,或采取折中的观点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道德心亦是一种自然冲动”^③。虽然各派对道德的理解不同,但他们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自己所理解和追求的道德目标具有普适性。其二是没有正确解释道德的起源。考茨基指出,在道德起源问题上,直到启蒙时代都未能解决。法国唯物论者没有释明;英国人虽然把道德看作与人类其他感官一样的“第六感觉”,但他们和法国唯物论者一样,也无法解释其起源问题。其三是不能解释人的道德理想何以产生。考茨基认为,道德问题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要实现这种善就必须反抗和推倒现存的权力,这就需要极大的道德热情。然而,在现存不合理的社会里,人的道德理想何以产生?在他看来,十八世纪的唯心论、有神论等学派认为它是在人类产生之初就从外界赋予人类的,法国的唯物论者也有假定存在超自然界的倾向。这实际上都是对道德理想的观念论解释。在考茨基看来,康德对于道德律及其起源的解释并未突破观念论。在他那里,道德律由纯粹理性所产生,属于超时空的纯粹精神世界。因此,他虽然坚决反对哲学上的神秘主义,但在伦理学上神秘主义又“找得一宽阔而不闭的得胜门,唱凯旋之歌而进去了”^④。显然,康德也无法解决自古代以来的道德律之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破除神秘主义这一障碍,此项工作始于进化论伦理学。考茨基认为,以达尔文为代表

①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第86页。

②③④[德]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董亦湘译,北京:教育研究社,1927年,第93、21、29页。

的进化论者主张道德律为一种社会的冲动,其发生由于动物生存竞争的需要。因此,在道德起源问题上进化论伦理学破除了神秘主义,超越了自伊壁鸠鲁以来的伦理学。但他同时指出,进化论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伦理问题,因为动物的生存竞争无法解释只有人类才有的道德观念何以产生。真正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之伦理。

在《伦理与唯物史观》中,考茨基用“唯物论的伦理”来指称马克思主义之伦理。这一表述方式显然是对新康德主义者错误观点的反拨,它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伦理相外在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世界观基础。考茨基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阐释,体现在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本质特征的论述中。首先,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生活为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之伦理主张道德律产生于社会需要。考茨基认为,在社会交往中,社会为规范个人行为从而会对其提出种种要求,只要社会关系不变,这些要求就能一直存在。对个人的这些社会要求逐渐成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习惯,且最后又被遗传下来,久而久之就成为道德的命令。他强调指出,道德律产生于生活需求,深合于社会需要。因此,风俗习惯要成为道德律必须符合社会需要,满足与社会交往有关的两个基本条件:“帮助个人为社会而思虑”和规范“个人对于别人的行为”。^①在他看来,道德律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道德并非普适的,而是相对的。其次,以人类社会的动态发展为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之伦理主张道德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考茨基指出,技术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沿着其进步的路线不断发生变化,这使人类对于事物的利害、善恶以及可能与不可能的判断发生变化,由此,道德的强度和适用范围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最后,以阶级斗争为突破口,马克思主义之伦理主张道德理想产生于新兴阶级反对现状所引起的复杂的希望与计划。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生变化的社会状态与保守道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大,新兴的被掠夺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道德理想。这种新道德理想是一种反对现存的道德及其社会基础的“极深的要求、极热的欲望及极强的意志”^②。在保守阶级中虽然也会产生新道德理想,但其不能产生作用,也不能变为现实,因为道德理想只有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才能产生效力,只有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才能得以实现。考茨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伦理中道德理想不是超自然的、超时空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现行的道德维护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及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剥削行为,因此,历史上新兴阶级的道德理想常常有相同的表现,如法国革命时期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它们就像一种“居于人类心中超出于时间空间的理想”^③。但是,这仅是表象的一致,在实质上它们依各个时代社会状态之不同,而包含着极不相同的社会诉求。另外,道德理想还具有可实现性的特点。考茨基指出,以前的伦理学说“以为道德有超自然的根源,我们居于地球上的动物体,只能希求这种极远的道德而不能达到彼”^④,因此,在他们看来道德理想决不能实现,它永远存在于彼岸世界。考茨基则反对这种观点。他在论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时指出,“自由与道德律之世界,固然是异于必然的世界。但是它也不是无时间无空间的世界,也不是超感觉的世界,而是从特殊的观察点所看出来底感觉界特别的一部分。它是我们未来的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着,我们要重新去整理这个世界。”^⑤因此,道德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它和阶级斗争的其他动力一样,是结合新兴阶级以反对现存势力的最强硬武器。随着新社会的确立,道德理想也将会实现,不过这要依赖于它与当时物质条件的相符合程度。^⑥

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本质特征的阐释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排斥伦理问题,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之伦理由于立足于现实的人类社会来解释伦理中的一系列重要

①②③ [德]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第131、147、148页。

④⑤⑥ [德]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第151、44、150页。

问题,从而揭开了其神秘面纱,克服了观念论伦理观的理论困境。在此基础上,考茨基进一步向前推进,反拨了伦理社会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批判。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发展与运动的规律的科学研究,对其合法性的论证无需借助于伦理;同样,作为其基础的唯物史观虽然没有否定道德理想及其作用,但完全夺去了其为指导者的地位,因为它主张人们的诉求和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由对当时物质条件的认识推论出来,而不是某种永恒的伦理原则的实现。

三、考茨基阐释唯物史观与伦理之关系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阐释存在着明显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进化论倾向。他不仅同进化论者一样,认为动物与人一样也存在着道德,而且赞同他们关于道德起源的观点,认为作为一种冲动,道德产生于生存竞争。考茨基对道德的进化论理解与他对社会及其与自然之间关系理解相关。在阐释社会及其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他认为自然是一般,社会只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因此,他关注的是社会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或一致之处而不是本质区别,虽然他也想尽力使两者有所区分,但他所说的区分最终都消逝在了二者的联系之中。这显然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伦理学上的进化论倾向不仅使他过高地评价了进化论伦理学在伦理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无法从本质上将它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区分开来。

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阐释显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在特殊时期为回应新康德主义而对伦理与唯物史观的解释,特别是他从伦理发展史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未系统论述过伦理问题,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涉及伦理时也是比较简短,且大多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进行批判的。这导致新康德主义者甚至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重要人物伯恩斯坦等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论述伦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忽视了伦理的重要作用,从而纷纷主张“回到康德去”,用康德的伦理学“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考茨基在《伦理与唯物史观》中把建立在马克思新唯物论基础上的伦理学称为“唯物论的伦理”,并首次从伦理发展史的角度把它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之伦理”,进而对之作较为全面的阐释。考茨基的这些做法及其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伦理较为系统地阐述甚至可以认为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初次尝试。

在具体观点上,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之伦理及其基础的阐释也比较切近马克思和恩格斯伦理观的本真精神,这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体现。第一,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强调道德的可变性。为了从本质上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其他伦理观区分开来,考茨基在阐释过程中首先论述的是其不断变化的特点,并且这种变化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神秘的力量,也不是源于与动物一致的本能,而是社会生活本身,这就既否定了道德的超自然性和永恒性,又将它与进化论伦理观区分开来,这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非常一致。恩格斯在此书中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①因此,针对杜林把“一种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道德强加给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的做法,他批判到,“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第二,依据唯物史观,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0、471页。

在论述道德对于社会生活依赖性的同时强调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如上文所述,考茨基在阐述道德的变化性、社会根源及道德理想的阶级性等本质特征时,强调的是道德对于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它只有适合于种种社会的要求才能在社会生活上产生有效的作用。因此,“社会发展之实际政策,不依于我们道德理想,而依赖于当时物质的条件。物质的条件,在最早时期,已于某种程度内决定人之道德意志,及新兴阶级的社会欲求。”^①但与此同时,考茨基也非常重视道德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他认为道德和别种理想的要素一样,也能促进经济的及社会的发展,且在这个过程中道德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某种社会的规范,起于某种社会的要求,社会的规范,愈适应于创造这种规范的一个社会,则这种规范,愈能使社会的共力协作,容易成功。”考茨基同时还重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他明确指出,“道德的规范虽依社会而变化,但不是与社会的要求有不断的变化或同样及同程度的变化。”它与其他产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样,在特定的时期内“能够脱离其基础,而为其独立的生命”。^②第三,反对经济决定论。在强调物质条件特别是技术因素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时,考茨基坚决反对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众所周知,新康德主义者之所以坚决反对唯物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在于他们认为其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考茨基指出,技术虽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决非是惟一的要素”。“人常常以为唯物史观是某种技术的条件即是某种生产方法的意义”,但对唯物史观的这种解释,“决非真实”,它仅仅能嘲笑其所误解的混合着技术的条件与生产方法的类似的唯物史观而已。^③后来,考茨基又从经济条件与经济动机的区分入手,从本质上将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区别开来。

考茨基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现今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他对伦理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阐释,特别是首先从思维方式上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与其他伦理区分开来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关注。

(责任编辑:杨嵘均)

Kautsky'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Ethic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 Interpretation: The Reaction against Neo-Kantian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EN Ai-p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ssue in Marxist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t is also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ed answering during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eriod. At that time, neo-Kantians, on the premise of the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ism, believed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was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lacked the ethical elements necessary for socialism and therefore needed Kant's ethics to supplement or replace its absence of morality. However, Kautsky argued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d not ignore ethical issues. On the contrary, it was just in the vi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Marxist ethics had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the ethical view of idealism. In the process of his reaction against neo-Kantianism, Kautsky interpreted Marxist ethics in terms of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actical basis. His interpretations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Kautsky; Neo-Kantia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t ethics

①②③ [德]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第151、139、122—123页。